

# 劳动力外流对中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福利效应研究\*

——基于微观调研数据的视角

□ 樊士德 朱克朋

**内容提要:** 劳动力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向城镇和发达地区大规模流动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相伴随的特征化事实。区别于已有研究聚焦劳动力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城镇和发达地区增长贡献度的研究偏向, 本文着重聚焦劳动力外流给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带来的福利效应, 结合作者在广东等 7 个省所开展的微观调研和深度访谈, 对劳动力外流对作为流出地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福利效应进行考察。研究表明, 除正向效应外, 智力外流导致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动力丧失, 陷入增长困境; 学界所预期的劳动力外流给欠发达地区带来的回波效应更大而扩散效应并不显著; 长期以来的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的福利受损; 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刚性的形成与固化进一步拉低着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承接能力, 形成其内生式发展的新瓶颈。基于此, 中央政府顶层政策设计与地方政府微观规制均需做出新的调整。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 福利效应; 智力外流; 劳动力转移刚性; 欠发达地区

DOI: 10.13246/j.cnki.iae.2016.11.004

##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伴随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特征化事实之一的是劳动力流动规模日趋扩

- 
3. Sarma M. 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 Economics, 2010
  4.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Capital Development Fund. 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ectors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06
  5. 陈三毛, 钱晓萍. 中国各省金融包容性指数及其测算. 金融论坛, 2014(9): 3~8
  6. 褚保金, 莫媛. 基于县域农村视角的农村区域金融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农业经济问题, 2011(5): 15~20
  7. 焦瑾璞.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中国金融, 2010(10): 12~13
  8. 李明贤, 叶慧敏. 普惠金融与小额信贷的比较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 2012(9): 44~49
  9. 潘功胜. 关于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几点思考. 上海金融, 2015(4): 3~5
  10. 吴国华. 进一步完善中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3(4): 32~45
  11. 周小川.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 中国金融, 2013(18): 9~12

(作者单位: 杨军, 马倩倩, 黄馨谊: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南京 210095;

张龙耀: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心, 南京 210095) 责任编辑: 吕新业

---

\* 项目来源: 本文为 2016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地区福利效应研究”(编号: No. 658), 2014 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劳动力流动与江苏新型城镇化协同机制研究”(编号: 2014ZDIXM016)、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2014 年度长三角改革发展研究课题“长三角流动人口政策评估及其比较研究”(编号: CELAP2014-YZD-07) 和 2014 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江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就业效应研究”(编号: 2014SJD149) 的阶段性成果

大、速度日益加快、具体流向日趋复杂,主要呈现为各省份之间、各省份内部、城乡之间、不同部门间、不同产业间、不同国家间等多元化流动趋向。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比2014年增长1.3%,其中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增长0.4%;比2006年1.32亿的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sup>①</sup>年均增长8.58%。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十三五”规划建议“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以及“建立健全人才流动机制,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促进人才在不同性质单位和不同地域间有序自由流动”。这一领域的问题也日趋成为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综观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聚焦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宏观层面研究,而且基本认为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一国的经济增长(Dolado等,1994;Barro等,1995;Lee,1997;蔡昉等,1999;陆铭,2002;王小鲁等,2004;刘秀梅等,2005;许召元等,2008);二是侧重劳动力流动对发

达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的中观层面的研究,较为一致地认为外来劳动力给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孔有利等,2004;陈朔等,2005;彭连清,2008;李国锋,2009)。

然而,目前对劳动力外流对作为主要流出地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福利影响的深入研究较为缺乏,即使有零散研究也多半停留在务工收入与劳务经济等层面。从国际视角也同样能得到验证,即相关研究同样侧重关注劳动力跨国流动对输入国(即发达国家)的贡献度以及劳动力市场效应的研究(Bauer等,1998),而劳动力流动对输出国(即欠发达国家)经济影响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极少受到关注(Monica等,2010)。即使近年来部分研究开始跟进劳动力外流对输出国的效应层面,也基本聚焦汇款回流、投资增加以及“智力外流”的现象描述等层面(León-Ledesma等,2004;Katseli等,2006)。进一步就实践层面而言劳动力外流究竟会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福利带来什么影响?基于此,本文尝试结合笔者2009—2010年的问卷调查<sup>\*</sup>和深度访谈(2012),重点聚焦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福利影响<sup>\*\*</sup>。

## 二、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外流的福利效应的考察

综观现有研究,大部分学者倾向认为,一方面,劳动力流入改进了流入地的福利(Ghatak等,1996);另一方面,劳动力外流给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带来了正向效应:一是提升了包括土地等在内的人均要素和资源拥有量,拓展了创收渠道,提高了外流劳动者和家庭收入水平,进而也有利于流出地的经济结构优化;二是农民工外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欠发达地区的隐性失业;三是

部分回流劳动力从发达地区所带回的资金、技术、信息和观念等,不仅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资本形成提供金融支持,也有助于自身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创业,进而促进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等。然而,在肯定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正面效应的同时,其负面的经济与福利效应更值得关注 and 深入研究<sup>\*\*\*</sup>。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16-02-29;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国家统计局网站,2008-02-22

\* 2009年9月至2010年2月笔者主要对发达省份(广东、浙江、江苏)和欠发达省份(安徽、河南、陕西和四川)的部分城市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050份,回收1784份,有效回收率达87.02%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聚焦的劳动力外流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福利效应主要包括其对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影响。鉴于本文的研究主线以及篇幅限制,并未关注劳动力流动对外流劳动者自身的福利效应,对于此,笔者已经另行撰文专门探讨

\*\*\* 特别说明的是,关于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正向福利效应得到了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故这里不做过多赘述。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观点是土地流转背景下劳动力外流往往会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经营。然而,本文认为近年来在政策引导下,尤其是当下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措施的推动下,农村土地流转开始出现并逐步加速。然而,因为政策体系与制度安排的不完善性、配套和扶持政策的不匹配性、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与相对滞后性、承租过程中的不规范性和不稳定性、土地出让方和承租方对政策预期的不一致性等,导致目前土地流转不仅在总体规模上相对有限,在区域分布上也并不具有普遍性。换言之,政策效果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显现,即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化经营的正面福利效应并不显著。笔者在欠发达地区的微观调研也验证了这一点

### (一) 智力外流: 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众多研究发现, 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劳动力的外流即所谓的“智力外流”(Brain Drain) 由于给输出国公共财政、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等所造成的潜在的负向效应而受到输出国越来越多的关注 (Harald 等 2011)。笔者国内调研发现, 欠发达区域外流劳动力并非全部是真正的“剩余劳动力”, 而且随着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不断发展, 这种所谓“剩余”的内涵与外延将有所改变。外流劳动力多为流出地相对优质的劳动力, 而留守者的生产能力相对低下, 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以往的“386199”(妇女、儿童和老人) 现象正逐步呈现向“6199”转变的趋势, 即很多农村地区的留守者仅为孩子与老人, 甚至形成了“空洞村”和“空心村”。

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的结果是改变了劳动力空间布局的原始均衡, 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供给视角来看, 呈现出“帕累托恶化”的特征。具体来说, 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 “386199”的人口存量结构便是典型例证, 进而带来两大影响: 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 二是“智力外流”造成了当地内在发展动力的丧失。这必然带

来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具有显著的弱化效应, 二是对其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负向效应。近年来内陆地区呈现的“用工荒”和用工成本上涨便是典型例证。

经济“新常态”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最为典型的直接表现是, 初始拥有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所谓的“剩余”劳动力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日趋不足, 劳动力要素报酬低的比较优势逐步递减。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成本方面, 笔者在江苏泗洪的调研(2012)发现, 因当地大规模劳动力外流, 在农忙期间雇一个普通劳动力, 每天需要 100~150 元, 甚至即使在正常工作日雇佣拥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如瓦工、木工等), 每天成本达到 300~400 元, 导致当地生产经营成本偏高, 丧失市场竞争优势, 进而打击农民务农积极性、影响农业发展, 更不要谈农业的科技化、集约化和现代化。

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传统部门的“智力外流”方面, 同样可以从笔者(2009—2010)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针对流动过程中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民工)的调研得到验证: 外流劳动力的年龄、学历、技术工种等人力资本都明显优于留守劳动力(如表 1 所示)。

表 1 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外流的人力资本状况 (%)

地区	平均年龄 (岁)	40 岁以下 所占比例	初中以上 所占比例	技术工种 所占比例	年务工 9 个月以上 所占比例
发达省份					
广东	29.13	98.92	97.02	92.00	90.01
浙江	31.14	88.84	93.12	88.78	93.26
江苏	30.65	88.89	94.54	83.43	82.98
欠发达省份					
安徽	30.85	79.41	80.36	73.26	76.96
河南	28.55	87.10	78.78	66.32	76.25
四川	34.16	84.13	73.00	75.70	79.00
陕西	31.30	78.68	92.23	69.63	59.80

注: 技术工种所占比例统计的是根据各省外流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和工种来判断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者占比, 具体包括车床、纺织、包装、挡车、叉车、化验、化工、会计、机修、监控、建筑、木工等

如表 1 所示, 从平均年龄 40 岁以下所占比例、初中以上学历所占比例、技术工种的占比等方面均表明了欠发达地区和农业部门优质劳动力的外流, 对工业化、城市化以及长远发展具有一定的外在负

面冲击。这种负向冲击容易导致地区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反过来进一步强化和固化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传统部门的“智力外流”态势。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具有小学学历的农民可使农业生产率提高43%，具有中学学历的则可提高108%，具有大学学历的可提高300%（张藕香 2009）。而中国外流劳动力很大一部分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大大高于农村平均文化水平，且大多数年龄在20~50岁之间、年富力强。因此，无论从文化素养还是年龄和体力看，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外流劳动力都是流出地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的外流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自身工业化、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和负向冲击更为突出。

对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智力外流给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内在障碍，国家相关部门已认识到这一问题。中央从2005年开始普及大学生村官政策，部分省（如江苏、河南）甚至从1995年就开始推行这一政策，“十三五”规划纲要要进一步提出“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和创业引领计划，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健全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到基层就业的激励政策”，“促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这无疑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提供了较为有力的智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高素质人才流失和农村人力资本萎缩的问题，同时有利于改善农村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然而，由于长效动态激励机制不健全、专业与农村发展需求不匹配、农村基层工作的复杂性、大学生村官微观主体的功利性及其所衍生出的政策预期目标与微观主体的激励不相容等原因，大学生村官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带动效应并不明显<sup>\*1</sup>，且形成了新一轮的“智力外流”：大学生村官网的一项调查表明，在5284名投票者中只有974人愿意继续留在农村，仅占18.56%<sup>①</sup>。截至2014年底，全国大学生村官累计流动24.8万人，其中进入公务员队伍9.2万人，占36.9%；自主创业1.8万人，占7.4%；另行择业13.6万人（包括进入事业单位7万人），占54.7%；考取研究生2300人，占1%<sup>②</sup>。由此可见，推行了十余年的村官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智力外流问题。

有研究认为，尽管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劳动力

外流或智力外流会导致短期人力资本存量减少，但可以提升欠发达地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动力，进而增大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最终促进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净增加。然而，这一演进机制或路径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并未发生，换言之，从短期来看，智力外流构成了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自身可持续发展乃至实现超常规增长的内在障碍。

## （二）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留守人群福利受损

西方最新的社会学理论以及新家庭经济学研究发现家庭福利受到家庭结构与居住模式的影响极为显著（Maclean 等，1997）。一般而言，家庭成员协作共同生活的整体福利要远高于家庭成员独自的个体福利，而中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家庭结构与居住模式均呈现“城乡鸿沟”式的分割状态，留守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大多数是老人和儿童，祖父母带着年幼的孙辈生活成为众多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常见的家庭模式。相比家里的主要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前，留守者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不仅家庭整体福利降低，而且老人和儿童的个体福利都有所受损。

具体来说，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尽管带来了一定的汇款收入，然而却导致了对家庭生活的长期缺位，老人不仅自己的生活无人照料，而且少有情感慰藉，更关键的是还要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日常家务、照顾孙辈，根本谈不上安享晚年。从这一层面看，其在健康、日常生活受供养、情感、家庭负担的分担等福利和幸福指数方面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损害。这与左冬梅等（2011）的结论较为一致。留守儿童同样因父母外流缺位，其在教育、习惯培养、亲子互动、心理健康、性格等家庭福利方面受到影响。相关统计显示，2013年5月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102万，占全国儿童数量的21.88%，（刘金松 2013）。全国妇联调查显示，2015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尽管扩大不明显，但仍呈现上升

\* 吕书良（2008）基于对大学生村官的微观调研和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村官政策的综合评价得分偏低，其对农村发展的正向效应一般

① “关于工作满三年后你会怎样选择”的调查结果。大学生村官网 2008-07-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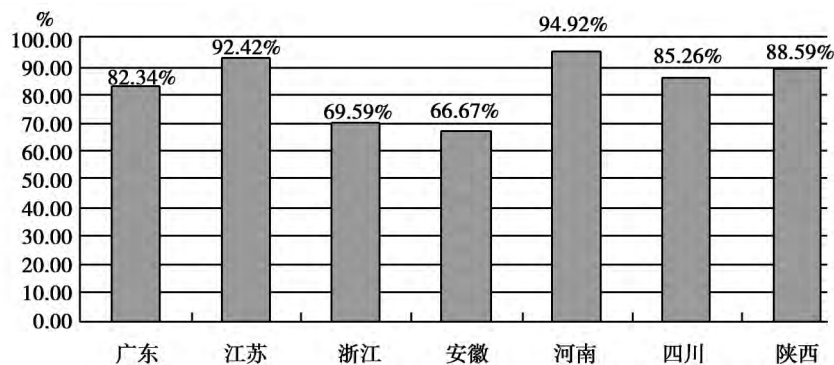
② 2015 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发布。人民日报 2015-07-06

态势。

笔者的实地问卷调研表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外流劳动力中很大比例(65%~95%)并没有携带子女一同流动,进而造成了留守儿童规模的扩大(见图1)。

农村留守儿童大多由父母以外的他人照顾,这给正值成长期的留守儿童带来了许多相关问题和困境:(1)安全保障缺乏。由于监护人的疏忽,留守儿童有时可能处于无人监管、自行其事的状态,容易侵害他人或受他人侵害,留守儿童溺水、伤亡事故时有发生。相关统计显示,被拐卖儿童中,流动儿童居第一位,留守儿童居第二位<sup>①</sup>。此外,留守女童权益问题越发突出,遭受性侵案件频发、屡禁不止。(2)情感慰藉缺失。留守儿童长期缺乏亲情抚慰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缺乏亲情的孩子往往容易焦虑、紧张、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能力差。截至2013年5月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57.14%(刘金松,

2013)。(3)受教育境况恶化。留守儿童往往会产生不被重视的感觉,容易产生叛逆行为,在校不遵守规章制度,常有迟到、旷课、说谎等行为。相关调查显示,留守儿童中47%学习成绩较差,41%中等偏下,10%较好,仅有2%为优秀<sup>②</sup>。(4)缺乏正确的人生规划,沦为“二代”农民工,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由于缺乏父母的指导与良好的家庭教育,很大一部分留守儿童没有正确的人生规划,沦为“二代”农民工,甚至由于价值观不正确、法律意识淡薄而走上犯罪道路。2008年全国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状况抽样调查和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显示,中西部省份农村留守儿童辍学比例高于其他省份,1/3的15~17岁农村留守儿童初中毕业后开始外出打工<sup>③</sup>。最新资料显示,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截至2013年5月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刘金松,2013)。



注:图中广东、江苏、浙江的比例表示其流入劳动力将自己的子女留在了家乡从而形成留守儿童的比例,而非这些发达地区留守儿童所占的比例;安徽、河南、四川、陕西的数据表示当地外流劳动力把孩子留在家乡的比例

图1 劳动力外流形成留守儿童的比例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外流劳动力的后顾之忧、降低流动成本、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而且能够增进留守人口的社会福利和幸福指数,进而完善农村社会

治理。

(三)劳动力回流的困境“循环累积因果论”中的“扩散效应”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并未形成

1. 多重因素造成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回流人员就业或创业效应欠佳。缪尔达尔(1957)所提出的

① 全国妇联.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http://tjty.china.com.cn> 2009-01-20

② 王爱军. 农村留守儿童现状. <http://www.gsws.edu.com> 2009-07-12

③ 马丽娜. 中西部农村留守儿童辍学比例高 1/3 大龄儿童打工. <http://www.china.com.cn> 2008-02-27

“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多重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使发达地区的累积扩张以牺牲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为代价,导致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状况相对恶化并延缓其进一步发展,由此将导致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在地区累积循环的动态过程中现实表现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即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其中,扩散效应是指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辐射效应,包括市场、资本、技术、信息等多元化先进要素的扩散;而回波效应是指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向发达地区外流,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外溢效应,而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制约影响。

从现有研究看,很多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会带来务工者收入的提升以及先进经验、理念的改进,这一系列的务工收入资金、经验与理念将随同外流劳动力的回流或回乡一同进入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和农业传统部门,进而能够带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即形成“扩散效应”。当扩散效应超过回波效应,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发展差距将逐步缩小。

然而,部分外流劳动力带着资金、观念、经验回乡创业,从理论上说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事实上,根据笔者在江苏泗洪(2012)的调研发现,以回乡创业或投资为动因回流的劳动力仅占被调查的回流劳动力的1.2%,由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经济环境、创业环境不佳,这批创业者的创业和创收也很艰难。由此可见,学界所认为的回流劳动力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创业所形成的“新经济增长点”并未形成。近年来,由于小城镇建设的推进,很多集镇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很多集镇店铺生意惨淡、经营商品寥寥可数,尚未形成有利于创业和发展的宏观环境。调研表明,发达地区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所带来的“回波效应”更为突出,要远高于“扩散效应”。目前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发达地区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回流效应强于扩展效应造成。

2013年7月1日笔者进行的电话访谈表明目前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创业效应并未形成良性循环:

案例1:刘某,女,34岁,湖北荆州人。她从17岁开始在外打工,先后到广东广州、虎门等地打工,做过车间工人、营业员。2003年,她与同为打工者的小黄组建了幸福家庭。2005年儿子出生。从孩子一岁开始,她再度外出务工,孩子一直在家由祖母照顾。考虑到隔代教育可能带来的问题,2009年小刘夫妇放弃了在广东虎门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发展。回乡后开了一家卖日用品的小店,自己当起了老板娘;丈夫在当地一家工厂上班,收入一下锐减到1000元左右。半年下来,其感受是这里的生意太难做了,当地人都舍不得花钱,连买条毛巾都要讨价还价好半天。算算账,扣除房租和营业税,她平均每月的收入只有600元左右。回乡后的生活状况远远低于预期。2011年,小刘重新回到广州,和丈夫共同经营了一家小型服装厂,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艰辛之后,目前为几家外贸公司做代工,经营状况良好。

近年来,为配合中央小城镇和中小城市战略,欠发达地方政府(如江西、安徽、河南、重庆、广西等)纷纷颁发了一系列措施和文件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sup>\*1</sup>。这些政策一般都侧重引资争项、减免税收、营造环境、加大金融支持等方面。但是,这些政策能否真正贯彻实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当地的经济状况、创业环境、人文观念是否足以支撑有能力的农民工回乡创业?答案未必是肯定的。大部分人并不愿意回乡创业,原因并不在于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没有感情,而在于当地创业环境较差,尤其是潜规则较多,企业很难生存,更谈不上发展。

2. 回流的“增量收入”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拉动效应犹如杯水车薪。外流劳动者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与福利效应影响的途径除了回流创业之外,就是回流的增量收入。根据笔者调研,外流劳动力的增量收入一般有两种去向:一是购买家电等耐用品;二是用于储蓄。由于耐用消费品往往为发达地区所生产,这种消费带动了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从中受益很少;储蓄形

\* 如《江西省劳动保障厅关于做好返乡农民工就业和接续社会保险关系措施》、《安徽省阜阳市关于认真做好春节期间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2009年广西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基金实施意见》、《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见》

成机制为,外流劳动者出于在住房、子女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考虑会选择储蓄。然而,调研发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储蓄往往又通过当地金融机构流向发达地区,进一步促进了发达地区的发展,进而拉大地区差距。综合这两个层面看,外流动力的增量收入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推动犹如杯水车薪。依靠外流动力的增量收入即劳务经济拉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式发展这一思路从长期来看更缺乏可持续性。

现实的情况是,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外流劳动力在发达地区获取的增量收入,除了维持基本的再生产之外,最终大多通过消费、储蓄回流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从市场需求、资本供给等方面“反哺”着发达地区,同时也映射出资本倾向性。由此,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外流劳动力对发达地区的贡献呈现双重性:一方面,为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以及附带的资本和技术;另一方面,有限的、分散的劳务增量收入,通过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变相地外流到城市和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大地区差距,这种变相的资金外流还导致本身就缺乏资金支持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资本短缺,从这一意义上讲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福利进一步受到了损害。

关键是如何发挥“循环累积因果论”中的“扩散效应”,增强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水平流动性,尤其是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化激励协同方式,改变以往由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向城镇和发达地区的单一流向,进而带动和实现其他要素资源在欠发达地区形成新的集聚进而发挥扩散效应。同时,其扩散效应的发挥或扩大还可以通过提高纵向流动性,即劳动力通过流动能够实现社会地位、社会名望和财富层次的改变和提升,由此,其回流后对流出地的扩散、辐射或外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更大。

(四) 劳动力外流的结果: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产业承接能力降低

部分外出农民工的回流和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交替循环,使得农村劳动力素质进一步下降:流出的是最优质的劳动力,留守的基本都是被发达地区“撇脂”后所排斥的劳动力,甚至为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双向排斥的劳动力,这必然影响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降低农村和

欠发达地区顺利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进而制约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

具体看,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外流,尤其是高素质和优质劳动力的外流,往往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即并不再倾向回流,一方面,为发达地区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进而降低了其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进而延长了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生命周期,阻断了产业转移抑或延缓了产业转移的时间表(樊士德等,2015);另一方面,还会导致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减少对教育等有利于人力资本提高和改善的投入,形成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因流动而越发稀缺的恶性循环,同时,也因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外流会带来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使得自身短期内依靠比较优势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缺失,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也将受阻。

当前中国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带来的是一种外生式的城市化,即外流劳动力并未被城市内生吸收,它建立在“农民与市民不平等”、“农村与城市不平等”、“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不平等”等基础之上,其结果是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优质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城市偏向的政策机制逐步涌向发达地区。一方面,导致流出地的普通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配置存量和质量双重下降,同时也降低了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匹配度,导致产业结构更为不合理;另一方面,劳动力外流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完善也产生了负向冲击,甚至部分地区沉淀出一个个日渐落后、破败的农村,近年来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空洞化”、“农村空心化”便是典型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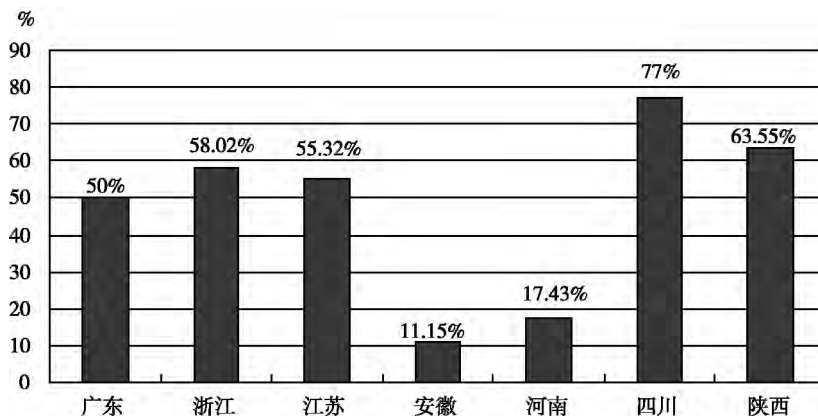
(五) 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刚性的形成: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新瓶颈

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还有一重重大危机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60%。笔者(2012)在广东东莞的深度访谈发现,93.05%的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的愿望非常强烈,长期漂泊在外使其更认可城市生活方式,对家乡没有太深感情,更不谈回乡发展的愿望,从长期看大多数没有回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欲望。

根据笔者调查,外流劳动力由于路径依赖、地区收入与福利差距、效用偏好等因素,劳动力从欠发达向发达地区流动后呈现不回流的趋向,进而形成“劳动力转移刚性”,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刚性特征更为显著,这无疑构成了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新瓶颈。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外流定势或刚性的形成,可以从图2中的工资相同情况下仍然外流的比例(50%~80%)得到验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流劳动力渴望扎根发达地区与城市谋求长远发展的倾向。然而也有例外,如位于中部地区的安徽、河南外流倾向相对较

低,可能与其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有较大关系。然而,这种刚性特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十分显著。

根据笔者调查,如若进一步考察各省的外流劳动力中长期可能会迁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比例状况,对这一外流倾向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图3迁出比例为未来可能选择外迁的劳动力比例,包括未来决定迁出与考虑未来区域间的收入等众多状况而可能外迁的比例。可以看出最高的外迁比例为四川的79%,最低的为安徽38.14%。



注:图中广东、江苏、浙江的比例表示这些省份外地流入劳动力的比例(即继续选择外流),而非这些发达地区省份人口选择流出的比例;安徽、河南、四川、陕西的数据表示当地劳动力的外流倾向

图2 工资相同情况下仍外流的劳动力比例

因此,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后续发展的新瓶颈进一步凸显:没有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人力资本这一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动要素,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刚性的强化以及外流的定势,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无论是农业传统部门还是非农现代部门均将因为优质劳动力的流出与缺失而进一步丧失发展的内在动力,反过来,这种内在发展动力的丧失又将固化劳动力外流刚性,无疑造成了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自身福利的“滴漏”。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一价值取向在案例2中更可见一斑<sup>①</sup>:

案例2:马飞,18岁,一家知名火锅连锁店里的传菜员。2009年10月初中毕业后在蚌埠农村老

家“玩了两年”,后因为亲戚的缘故到镇江打工。短短几个月的打工经历让马飞对城市生活还不甚了解。但即便如此,几乎从未规划过人生的马飞对未来却有个坚定信念:肯定不会回家种地。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们不仅不愿回农村,而且也回不了农村。马飞老家“大概还有三四亩地”,依靠这些薄田何以支撑他们已被城市文明“开发”的生活需求和消费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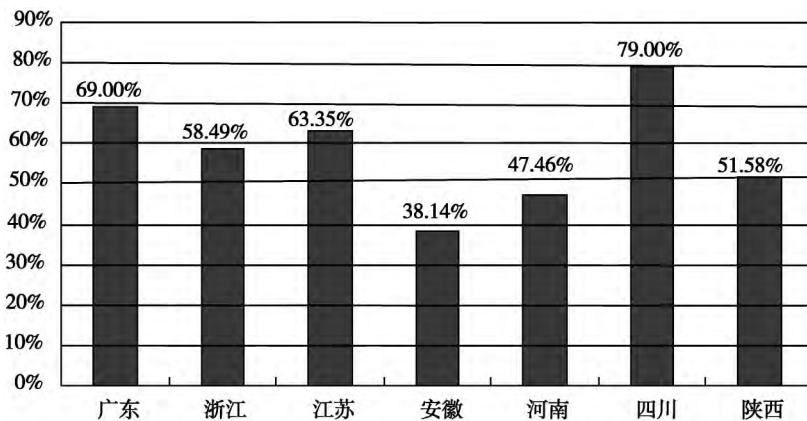
王春光(2010)曾如此总结: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的“三高—低”特征。这一群体大多没有务农的经验和经历,他们更追求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享受,因此回到对他们来说与城

<sup>①</sup> 王鹏程、梁和峰. 努力摆脱“农民工”的“新生代”——追寻新生代农民工的镇江足迹之一. 京江晚报 2010-02-05



市和发达地区有着天壤之别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无疑是小概率事件。尽管在未来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外流到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可能会遭遇劳动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的就业困难(蔡昉,2013),也很难改变这一刚性特征。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要调整、要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

这批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他们应构成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和核心力量。然而,当地发展中坚力量都流出了而且无回流的欲望,其实现赶超式发展的内在动力何在?这不仅构成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更构成了中央政府值得思考的重要课题。



注:图中广东、江苏、浙江的比例表示对外地流入劳动力进行调查得出的比例(即选择外迁),而非这些发达地区省份劳动力未来可能迁出的比例;安徽、河南、四川、陕西的数据表示当地劳动力对未来迁出的预期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2009—2010年分别在发达地区(江苏、浙江和广东)与欠发达地区(安徽、陕西、河南和四川)的实地调研统计加工得到

图3 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未来可能迁出的比例

###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重点聚焦劳动力流动给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带来的福利效应。通过在广东等7省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由于劳动力转移刚性的存在以及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特有的制度和 cultural 环境,劳动力外流给中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带来的负向福利效应更值得关注。“智力外流”导致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丧失,构成了其增长和发展的内在障碍,与之相伴随的还有欠发达地区留守儿童和老人的福利受损。“回波效应”更大而“扩散效应”并未在欠发达地区出现,相反,劳动力过度外流不仅导致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短缺,还导致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承接能力降低,进而导致其潜在产出漏出或损失;更值得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刚性的形成与固化则构成欠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新瓶颈。

劳动力外流给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所带来的负

向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长期以来的赶超战略、政府主导工业化和偏向城市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这一政策偏向尤其是更多地偏向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在特定阶段和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也带来了典型的城乡二元分割、地区发展失衡、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和经济问题。“包容性增长”为如何消除劳动力外流过程中所引发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负向效应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在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既要实现城镇和东部沿海地区的飞速发展,又要带动和辐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同步发展;既要处理好城镇失业人口的就业和福利问题,又要实现流动劳动力的就业和福利公平;既要惠及外流劳动力人群,也要实现留守人口的福利提升。要让改革开放成果惠及每个地区、城镇和农村、每一个人群,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无论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顶层设计,还是作为流入地的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或作为流出地的地方政府的微观规制,均需要考量和权衡劳动力外流给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所带来的负向福利效应,即发挥新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在提升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福利效应中的正面意义,同时,不能因为存在负向效应而针对劳动力外流采取“堵”的思路。因此,在宏观政策的顶层设计层面,一方面,借鉴日本依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劳动力流动不同阶段采取差异化的政策:经济发展初期或快速期偏向重工业吸纳流动中的劳动力。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可以借鉴日本将重点放在鼓励劳动力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内部就近流动,如放开落户限制、进行免费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及解决子女受教育问题,拓展和增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在这一过程中加大中央财政扶持。另一方面,借鉴日本对农业现代化所采取的财政扶持和补贴、直接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以及间接对扶持农业的金融机构进行补贴等方式,甚至可以尝试设置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专项以及相应的财政和金融配套资金并进行全程的包括技术在内的多元化指导与监管,重点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财政金融扶持,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设计,鼓励和加

快土地流转,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并建构配套的扶持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经营,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超常规增长和内涵式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红利,从而吸引劳动力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回流。事实上,近年来的就近转移、就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思路便是典型体现。在地方政府的微观规制层面,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可以借鉴欧盟在促进成员国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进而消除不公平和歧视性问题方面所采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协调政策,可以在一定范围尤其是区域协同的统一框架下,建立既竞争又合作、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良性关系,如建立区域间以及城乡间可转移和可衔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发达地区可以尝试为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外流所导致的漏出效应设计和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和帮扶机制,欠发达地区应在国家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框架下改变传统“务工经济”的思路,转向完善劳动力市场、吸引劳动力回流和人才集聚、弱化劳动力外流刚性,与发达地区政府协同推进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分别设立产业转移示范市(县)、产业承接示范市(县)、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或信息平台,探索良性互动机制,进而促进劳动力城乡、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发挥协同效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参考文献

1. Dolado Juan J & Goría Alessandra & Ichino Andrea, Immigration,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in the Host Country: Evidence from Pooled Country Dat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Springer, 1994, 7(2): 193 ~ 215
2. Barro R. J., Sala-i-Martin X.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acGraw-Hill, 1995
3. Lees Francis A. *China Superpower: Requisites for High Growt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4. Klaus Zimmermann & Thomas Bauer, Cau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survey in Gorter P., Nijkamp & Poot J. (eds.), *Crossing Borders: Regional and Urban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ldershot: Ashgate, 1998: 95 ~ 127
5. Monica Roman & Cristina Voicu, Some Socio-Economic Effects of Labor Migration on Send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Romania,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2010, 7(548): 61 ~ 76
6. León-Ledesma Miguel and Matloob Pirach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Role of Remittances in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4, #2(4): 65 ~ 84
7. Katseli Robert E. B. Lucas and Theodora Xenogiani,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Sending Countries: What Do We Know?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 2006, No. 250
8. Ghatak S., Levine and S. Wheatley Price, Migration Theories and Evidence: An Assess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996, 10(2): 159 ~ 198
9. Harald Fadinger & Karin Mayr,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Unemployment and Brain Drain, [www.norface-migration.org](http://www.norface-migration.org), 2011
10. M. Maclean & J. Eekelaar, *The Parental Obligation: A Study of Parenthood Across Households*, Oxford: Hart Publishing, 1997
11. 蔡昉, 王德文, 张车伟, 谢建华. 中国经济增长: 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就业结构.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 1999

12. 陆 铭. 劳动经济学——当代经济体制的视角.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13. 王小鲁, 樊 纲. 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 经济研究 2004(1): 33 ~ 44
14. 刘秀梅, 田维明.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管理世界 2005(1): 91 ~ 95
15. 许召元, 李善同. 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经济学季刊 2008(1): 53 ~ 76
16. 孔有利, 王 荣. 劳动力流动与江苏无锡市的经济增长.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2004(4): 118 ~ 122
17. 陈 朔, 冯素杰. 经济增长速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南开经济研究 2005(5): 45 ~ 47
18. 彭连清. 区际劳动力流动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研究 2008(12): 46 ~ 50
19. 李国锋. 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9(3): 31 ~ 36
20. 张藕香. 人力资本不均等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208
21. 吕书良. 新农村视角下大学生村官及其政策考量. 中国农村观察 2008(3): 53 ~ 59
22. 左冬梅, 李树茁.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 公共管理学报 2011(2): 93 ~ 100
23. 刘金松. 留守儿童需要的不仅仅是安全. 经济观察报 2013-05-13
24. 蔡 昉. 中国经济改革应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证券网 2013-07-02
25. 樊士德, 沈坤荣, 朱克朋.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转移刚性与产业区际转移——基于核心—边缘模型拓展的数值模拟和经验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2015(12): 94 ~ 108
26. 王春光.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青年探索 2010(3)
27. 蔡 昉. 中国经济改革应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证券网 2013-07-02

(作者单位: 樊士德: 南京审计大学, 南京 211815;

朱克朋: 安徽工业大学, 马鞍山 243002)

责任编辑: 李玉勤

## MAIN CONTENTS

**Does Farmland Transfer Bring about the Synchronous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Farmer and Rural Area?** ..... *KUANG Yuanpei and LU Yufeng*( 4)

Farmland transfer is the core and key of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 and farmer ,and farmland transfer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is feasible.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farmland transfer and the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elastic coefficient to calculate the effect of farmland transfer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farmers and rural area( “Three R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2001 to 2012.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ects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Three Rural Transformation”is unbal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rural transformation lags behind the agricultural transition ,but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overall three is basically the same. Moreover ,the effects of the provincial farmland transfer o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are divided into eight categori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rough the top design ,the balance of farmland transfer power ,the protection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and the middle class , “four modernizations”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and 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managing farmland transfer etc. ,the effect of the farmland transfer on “Three Rural Transformation” realize the linkage development.

**The Dilemma and Path Choice of Promoting Property Right Marketization of Rural Resources in China** ..... *FU Gang ,CHEN Wenkuan ,LI Siyao and TANG Hong*( 14)

This study first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ources ,and the type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property right marketization of rural resources. Then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present dilemma in process of the property right marketization of rural resources in China ,such as the unclear definition of resource property right ,the incomplete powers and functions ,the imperfect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and risk protection mechanism ,the low efficiency and effect of property flow. Finally ,the study points out path choice of the property right marketization of rural resources ,including the marketization ,the capitalization and market transa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Empirical Evaluation on County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 Based on 52 Counties in Jiangsu** ..... *YANG Jun ,ZHANG Longyao ,MA Qianqian and HUANG Xinyi*( 24)

**Welfare Effects Research on Rural and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Labor Outflow in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Micro Survey’s Data** ..... *FAN Shide and ZHU Kepeng*( 31)

Different from the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growth for both China and developed regions ,combined with author’s micro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carried out in 7 provinces( Guangdong etc) ,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welfare effects o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labor mi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cept for positive effects , “brain drain” results in the losing of development power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facing with the growth dilemma ,and the diffusion effect does not appear in the less developed regions obviously while the echo effect is bigger ,on the contrary ,the welfare of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left behind and is damaged and so on. Therefore ,the top-level policy design by central government and micro-regulation by local government both need the new adjustments.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nking the Increase in Land Use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with the Decrease in Land Used for Rural Construction on Farmers’ Welfare: Taking “Ten Thousand Hectare Fertile Farml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 *SHANGGUAN Caixia ,FENG Shuyi ,LU Hualiang and QU Futian*( 42)

Based on the Amartya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theory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pproach ,this paper constructed farmers’ welfare index system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the linking the increase in land use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with the decrease in land used for rural construction on farmers’ welfare ,applying survey data of farm households collected from “million hectares of fertile farml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Jiangsu Provinc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armers’ rights to know , to participate and to negotiate have not been effectively protected ,and some farmers have been forced to move to the centralized resettlement area. Alth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inking the increase in land use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with the decrease in land used for rural construction improves the level